

# 探析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路径

黄伟志<sup>1</sup> 唐素婷<sup>2</sup> 万新冉<sup>2</sup>

1 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人民政府, 广东广州, 511335;

2 广东健力宝股份有限公司, 广东佛山, 528100;

**摘要:** 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一方面, 而且是实施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, 同时还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点举措, 我们要始终坚持做好乡村治理工作。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, 我们发现基层存在一些问题, 例如基层的党组织战斗不够强, 乡村治理主体单一, 社会参与度低, 数智赋能还不足等问题, 因此要不断完善和优化我们的乡村治理路径, 包括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的乡村治理格局、数智化治理、法治治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改善措施。这样才能更加有利的推动我们乡村的发展, 做到真正的帮助人们走上致富道路, 从而更好的完成乡村振兴的目标。

**关键词:** 中国式现代化; 乡村治理; 治理路径; 乡村振兴

**DOI:** 10.69979/3029-2700.25.11.092

## 1 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治理

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, 包含五方面的现代化: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; 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; 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; 四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; 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<sup>[1]</sup>。

乡村治理是一个过程, 即乡村治理多元主体之间通过一定的关系或者行为模式, 共同实现乡村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等方面建设的目标, 是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在一定规则或行为规范指导下的活动, 也是历史与现状交互作用的结果。通过探索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, 对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通过对乡村治理的相关文献查阅可以了解到, 李帅<sup>[2]</sup>从观念、组织、技术和环境四个角度提出以“三治融合”为支点的乡村治理方式, 进而推动乡村的善治之治, 提升了我国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; 陈顺<sup>[3]</sup>在云南省安宁市进行调查与分析后, 认为只有将“三治”融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; 殷浩洋<sup>[4]</sup>发现, 要达成乡村的振兴以及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, 则要坚持党的领导, 加强制度建设, 使多种主体参与到乡治的过程中来, 在此过程中更要完善村民自治, 强化“三治”相融理念。贾建平<sup>[5]</sup>认为构建自治、法治、德治、数治“四治融合”的矛盾纠纷治理体系建设可以在源头上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纠纷, 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提高人民的幸福感; 张海玉<sup>[6]</sup>认为乡村治理应该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, 共同促进乡村振兴; 高小安<sup>[7]</sup>研究表明数字技术能够赋予乡村治理新动

能, 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,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。

综观前述, 目前已取得一些乡村治理的成效,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。基于此,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乡村治理的一些存在问题, 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的路径, 以期助力乡村全面振兴。

## 2 乡村治理存在问题

由于乡村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, 影响并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因素也较为复杂。目前从部分地方的做法来看, 影响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因素目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:

### 2.1 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足, 战斗堡垒作用不强

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“三力”(即统领力、凝聚力及执行力)不强, 导致该基层党组织出现软弱涣散现象, 制约了农村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。例如有的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党性意识淡化, 在党言外、在党不忧己高居; 有的党员干部表率、率先垂范作用差, 在工作、生活中存在不严不实现象; 有的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不规范、不扎实的现象。

### 2.2 农村治理主体单一, 社会参与度不够

乡村治理主要依靠基层政府及村“两委”, 村民、乡贤、社会组织等参与渠道有限, 多元共治格局尚未形成, 且多元主体公共意识和参与动机比较薄弱,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大多依靠一个或几个核

心人物来主导，参与意识和能力参差不齐，组织松散、缺乏规范。青壮年外流造成“能人治村”困难，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参与治理的能力受到限制。

### 2.3 数智技术使用较低，赋能乡村治理不到位

在农村，因为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做支撑，使得很多新事物都很难引进、换代升级，再加上部分农村不太发达，导致有很多先进的技术难以普及及推广到农村。此外，有些较富裕的农村，存在“重硬件轻软件”的情况，数智平台用的人少，特别是老年人使用率更低，线上没法全部覆盖所有村民。

### 2.4 法治化水平不足，村民法律意识淡薄

虽然村民的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，但村民们对一些法律知识的了解很少，固化了自己的行为习惯以后，想从内心深处摆脱出来还是很难的。很多村民遇到问题不是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，而往往选择上诉或者是私力救济等手段。“信访不信法”的思想依然严重，基层干部依法治理能力仍不够，存在“以言代法”“人情执法”等现象。

### 2.5 人才结构失衡严重，乡村治理活力不足

发展的关键是人才，但乡村治理的发展却受到人才结构失衡的极大制约。农村主要以青壮年外出务工为主，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偏大、身体素质较差，留在村里的以“老弱病残孕”居多。农村基层干部待遇相对较低，农村干部学历主要以大专为主，本科学历人才愿意留在农村发展建设的意愿仍不强，参与农村基层治理较少。

## 3 乡村治理路径

### 3.1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，夯实战斗堡垒作用

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目标，关键在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，重点应从党员示范效应与组织凝聚力两个维度同步发力。必须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效能和统筹协调能力，有效整合各类治理资源，确保党组织在农村多元治理格局中的主导地位。通过创新政策宣传方式，激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，使党员真正成为推动发展的排头兵。完善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，精准把握社情民意，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同时要健全基层监督考核机制，优化村干部激励保障制度，全面提升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。例如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罗家村为

打造第二批省“百千万工程”典型村，组建了一支“能人班子”当好“发展领航人”，严格落实“三个一肩挑”制度、“两委”干部 100%交叉任职，规范干部考核机制，完善各类组织定期向村党委报告工作机制，全面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“三力”（即统领力、凝聚力及执行力）。

### 3.2 构建齐抓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，基层治理模式创新

分阶段推进自治、法治、德治与数治有机统一的“四维协同”治理体系，加速构建富有生机、安定有序的乡村善治格局。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组织动员效能，充分发挥党员队伍的示范带动作用，通过优质党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升级。整合调动各类社会资源的联动优势，重点培育以公益服务、互助帮扶为特色的基层社会组织。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，重点针对老年群体、残障人士、未成年人及特殊困难家庭等对象开展精准帮扶。例如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高滩村党总支部在 2024 年组建了温泉酒店党员突击队参与支持绿美广东生态建设、派潭“村晚”、酒店活动设计、赛事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，切实发挥了该党支部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创新了基层治理模式。

### 3.3 构建数智治理新生态，促进乡村治理效能跃升

当前，以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，深化了经济发展、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现代化进程。近些年来，在数字中国、数字乡村的发展思路下，对于乡村治理而言，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借助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构建新的治理体系，在此基础上，着力构建乡村大治理的新局面。现代数字科技已深度融入社会各领域，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有关键作用。通过消除信息壁垒、激发群众参与热情，可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。遵循城乡发展规律与信息技术演进路径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。运用智能技术重构基层治理体系，将大数据分析、云端计算等前沿科技与乡村治理有机结合。加大数智基础设施建设，重点推进“互联网+”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，加速实现村级事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。构建多功能基层治理信息平台，定期举办智能工具使用活动，推出老年人合适的智能设备，定期组织志愿者上门教导村民使用数智工具，既拓展村民参与治理的渠道，又提升村级服务的智能化水平，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精准化与现代化升级。比如，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西南村与增城区融媒体中心合力共建“智慧广电”示范项目，加强学

校、医院、养老院之间的信息化链接，联手开展“智慧广电+教育、医疗、养老”等场景应用，将“互联网+”系统将逐步接入农村日常工作生活各个领域，基本实现村民办事不出村。

### 3.4 健全法治保障制度，构建平安治理新格局

强化法治宣传教育实效，健全县域行政权力清单化管理机制，严格规范涉农行政决策程序，纵深推进基层执法体系整合改革，加强县域司法人才梯队建设，提高乡村法治建设质量，筑牢平安乡村建设根基；创新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配置，健全农民权益司法保障体系，建立“村级调解-市县仲裁-司法终局”三级协同矛盾化解机制，确保纠纷调处高效有序。深化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实践创新，构建“智能网格+数字管理”的乡村治理新范式，完善农村治安立体化防控网络，全面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化、专业化、智慧化水平。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，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、宗族势力及各类违法犯罪行为，切实保障农村社会长治久安。如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司法局联合光辉村“两委”依托综治维稳中心这一主阵地，从综治维稳中心遴选优秀律师组建了一支 8 人的公益法律服务团，为光辉村提供 55 次的公益性法律服务，同时积极整合“羊城慧调解”“增心办”等线上线下的平台资源，村民只需打开手机微信小程序，便可以进行在线的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、矛盾纠纷的调解，2024 年共有 51 名村民一键申请调解。

### 3.5 打造人才兴村生态圈，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

加强村级后备力量培育，提高村“两委”干部待遇，采用“导师帮带+理论学习+实践练兵”方式，把致富能手、返乡大学生、退役军人等人员引入到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及后备干部队伍，并组织他们参加矛盾调解、土地流转、环境整治等工作，在实践中锻造成才；建立人才储备“蓄水池”，深化与外出高学历优秀人才联系，吸引一批想干事、敢干事、能成事的优秀人才返乡创业，选好用活当地种植大户、致富带头人的技术人才，充实到乡村一线产业中去；大力实施乡村治理人才评价与激励政策，建立健全重能力、重实绩、重贡献的人才评价制度，完善能力素质突出、以实绩衡量的乡村人才评价体系，根据不同类型人才“量身定制”职业发展空间、畅通晋升渠道，使更多的人才愿意扎根基层、服务基层，助推乡村振兴发展。

## 4 结论

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，是服务人民群众的第一线，也是连通党中央大政方针、人民群众安危冷暖的“连心桥”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多种措施联动、多方面政策配套，构建协同发展的解决方案，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，切实解决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全力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，全面提升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能力，充分运用数智赋能乡村精准化治理，助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刘栋.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与实践遵循——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考察[J]. 马克思主义研究, 2025, (03): 39-48.
- [2] 李帅. “三治融合”：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完善路径[J].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 2025, 40(01): 68-72. DOI: 10.13947/j.cnki.yyzyxb.2025.01.011.
- [3] 陈顺, 李宏. “三治融合”视角下安宁市乡村治理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[J]. 山西农经, 2025, (05): 1-3. DOI: 10.16675/j.cnki.cn14-1065/f.2025.05.001.
- [4] 殷浩洋. “三治融合”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困境与路径研究[J]. 智慧农业导刊, 2025, 5(05): 75-79. DOI: 10.20028/j.zhnydk.2025.05.017.
- [5] 贾建平. “四治融合”：乡村矛盾纠纷治理的逻辑进路及优化路径[J/OL].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, 1-10[2025-05-01]. <https://doi.org/10.19736/j.cnki.gxjcyxb.2025.0208>.
- [6] 张海玉.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体系的路径优化选择[J].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 2025, (02): 75-77. DOI: 10.16145/j.cnki.cn23-1531/z.2025.02.032.
- [7] 高小安, 牛亚鑫.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——基于南宁市武鸣区 M 村的实证分析[J]. 现代营销(下旬刊), 2025, (01): 111-113. DOI: 10.19932/j.cnki.22-1256/F.2025.01.111.

作者简介：黄伟志，(1989-)，男，汉族，广东广州人，硕士研究生，政工师，研究方向为基层党建、基层治理研究。